

現代性的理論化之路

「人類理性在自身的某個認知面向上，面對著獨特的命運，它被一些無法擺脫的問題所擾，因為這些問題是由其自身的本質所展現的，但它卻又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它們超越了人類理性的一切能力^A。以康德(Immanuel Kant)的觀點而言，這是一個人類必須面對的情況。有些問題是無法逃避的，即使我們沒辦法找到確定的答案。本書的論點在於，相對而言，社會理論與社會科學皆旨在規劃一個適合自身的認知範疇，以使得原則上既沒有無法擺脫的問題，也沒有找不到的答案。社會科學一直傾向於棄絕有關無法逃避性(inescapability)與可達致性(attainability)的議題，並將之視為敵手而必須加以對抗^B」

康德於十八世紀晚期撰寫《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A 康德(Kant, 1993 [1781]: 3 [A VII]), 翻譯已修改。

B 「社會科學」一詞的意義與內涵已隨著歷史而改變，並時常引起爭議。我的論點仰賴於社會科學的史料，並藉由它進行運作，這些史料包括社會研究和社會理論，無法在此完全闡明。若有時看似需要一個更完整且通常更明確的解釋，史料中的要素將由 Wagner(2001)提供。為了避免誤解，撇開所有批判不談，我可能也會補充，我並非必定要將自己的想法置於社會科學的範疇之外。更確切而言，我本人的研究可被理解為旨在拓寬該詞彙的意義。

Reason), 該時期在許多不同層面上被解讀為極度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在啟蒙運動遲暮之時寫作, 當時知識份子已開始針對那些對自由與理性的讚譽作出回應, 這些讚譽經常被認為是浮誇不實的。然而, 當時也是政治現代性起步之時, 人們經常將此起點與美國及法國革命的出現連結在一起, 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 他正好在一種理性模式崛起之前寫作, 而該模式很快就被認為社會科學, 該學門基本上就如我們今天所認識的那樣。但是, 在他寫作之時, 社會科學所關切的議題與論辯方式一般而言皆尚未脫離哲學的範疇, 尤其是政治哲學。

換言之, 在十八世紀晚期此一歷史性時段, 不但概念及智識方面發生重大轉變, 政治制度也同時歷經重大變遷(參見最近的作品 Heilbron et al., 1998)。這兩種轉變的相隨並存, 使我們得以(且往往是順理成章地)將「現代社會」的崛起與社會科學的出現連結在一起, 並視之為適用於現代性的反思性自我理解形式。就這點來看, 此雙重轉變將標示出現代性在智識與制度層面上的建立。然而, 我將試圖主張, 這兩項轉變之間雖然關係匪淺, 但此關係是充滿疑義的。

依據智識轉型的觀點來看, 哲學和新興的專門科學在議題上的分隔, 經常被視為是能夠讓知識大幅躍進的一種分化。根據此種觀點, 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各種科學, 不僅擺脫了哲學的監管, 也掙脫了限制它們發展的枷鎖。它們的任務與成就, 變成是要系統化地提供有關社會世界的「實證」(positive)經驗知識。相對而言, 我將在下文中主張的觀點是, 此區隔已同時造成社會科學無力處理一些重要議題, 而這些議題在社會科學自身的知識綱領以及對現代性的詮釋上, 都具有基本的重要性。

和哲學劃清界線之後, 社會科學家得以展開經驗研究策略, 而將知識論的問題留給知識社會學、社會科學哲學, 以及

科學社會學等次領域。那些次領域內的論辯幾乎都不曾回到社會科學活動的核心所在。然而，由於社會世界對人類認知所形成的阻礙，會隨著情況和時間而有所不同，因此有關社會世界自身知識的性質，以及取得知識的方法等問題，仍必須維持於社會科學的核心(參見第一章)。

當代學術機構對經驗學門與規範學門之間的明確區隔有所認知，前者包括社會學與政治科學兩大學門(此二學門彼此間的關係常是不穩定的)，後者則意指政治哲學，此學門大多伴隨著對政治思想歷史的興趣。然而，以歷史角度而言，社會科學崛起時所關注的議題，目前已被認為屬於政治哲學的範疇。社會科學已藉由不同方法，處理那些有時被稱為社會秩序問題的議題，但更適切的想法是將那些議題視為關乎政體的可行性，然而，社會科學並未將那些方法與政治哲學所採用的方式重新連結起來。因此，社會科學就令自身失去了某種能力，無法藉由反身性去理解政治議題(參見第二章)。

直到最近，社會科學才發展出研究人類自我問題的興趣，而系統性的發展則是從二十世紀早期才開始。除此之外，社會科學也大多忽視了人類再現自我的各種方式，這些方式出現在諸如哲學等其他領域中，但或許更重要的是出現在文學中。於是，社會科學看待此問題時，傾向於從一個已充分發展、穩定的個人認同之觀點出發，而非將自我的連續性與連貫性作為開放議題以供探討。唯有察覺到我們必須假定世界具有本體論的穩定性，以使社會科學有可能存在，同時也假定人類的取向與行動是連貫的，並據此預期世界在政治上的穩定，我們才有可能理解上述社會科學的焦點(參見第三章)。

社會科學在處理知識確定性、政體可行性與自我連續性這些問題的方式上，有個共同點：時間一直被認為是毫無疑義的。十九世紀時，社會科學與歷史科學在哲學的庇蔭下同時崛

起。這兩個新領域共同使用了回顧性的普遍公式，即我們現在所謂的經驗轉向。然而，非比尋常的是，它們各自發展成不同領域，具有相異甚至往往相對的議題。社會科學假設當代社會結構是絕對新穎的，並藉以宣稱自身具有專門性的基礎。在假定現在與過去之間是斷裂的情況下，社會科學無可避免地採用過去的概念，以及過去和現在的關係，但卻鮮少闡明自身對過去可觸性的看法(參見第四章)。

- 3 關於未來，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至少在十九世紀時，新興的社會科學家就意識到自己已承襲了各種相互關聯的問題，尤其是來自宗教和神學方面，同時他們也瞭解到，末世論的概念是此承襲的一部分。然而，他們宣稱自己有關社會進化的想法已經日漸取代了早先的智識形式。換言之，即使揚棄了所謂的歷史哲學思考模式，未來依然是可知的。二十世紀時，社會科學在直接處理有關未來的議題時，基本上更小心翼翼，然而仍有些顯著的例外，尤其在一九六〇年代之時。雖然如此，人們對瞭解未來的興趣依舊活絡，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架構，也將終極目標訂在促使未來持續是一目了然（參見第五章）。

經由討論這一連串議題，我的首要目標是，指出過去兩百多年的發展，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的計畫不是將某些問題排除在外，就是將這些問題貶謫到次領域，而這些問題在早期對於人類社會世界的反思中持續出現。此宣稱本身並不新奇，但人們以各種極為不同的方式加以評估，既視之為一種必要的進展，也認為它是令人遺憾的損失。雖然我同意這當中涉及了相當大的損失，但本書並非旨在對於智識歷史提供任何懷舊的詮釋，而是致力於證明，那些被排除或遭到降格的議題，在既不明顯也未被闡明的情況下，依然是社會科學和社會理論的組成要素，而辯明這點即為我的第二個目標。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我想要指出，此種將社會科學計畫在歷史上與其他智識議題及形式分隔開來的特殊方式，和一種將現代性概念化的類似特定方法有關。我們應該將現存的社會科學，視為一種詮釋社會歷史經驗的特殊方法，而非依據一種符合社會政治現實的知識形式觀點，將社會科學連結到現代性。或者反過來說，經常展現其多樣性的社會科學，已在理論化現代性的既有可能性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此空間相當有限。社會科學將某些問題從其關注的名單中排除，這些問題的答案已透過社會科學的運作模式去證明是不可得的，社會科學即藉由此種做法，試圖讓現代性帶來的所有問題皆可找到答案。因此，社會科學致力於更強有力地解讀社會世界，卻使得經由現代性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其自身無法追隨西方(以及其他)社會的歷史腳步。

壹、現代性的歷史與理論

現代性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以某種固有的張力為特徵。就一方面而言，社會科學作為對人類社會世界的反思性知識，「現代性」是讓其得以出現並存在的條件。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目標及任務在於，將「現代性」視為一種歷史性的社會形構而將之概念化，並予以分析。就第一種意義來說，「現代性」指涉的是一種哲學狀況，尤其是知識論的面向；以第二種意義而言，「現代性」則指涉一種歷史的、經驗的面向。正是在這些基礎上，社會科學崛起時的脈絡，以及和哲學之間據稱的分離，在社會科學身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當這些社會科學旨在處理簡單的「現代性」，將之視為整體的社會群集時，此印記會變得尤其明顯，而社會科學本身也是該群集的一

部分。換言之，「現代性」一詞無可避免地帶有雙重意涵；它總是同時具有哲學性與經驗性，或既有實質性又有暫存性(Yack, 1997)，抑或引述一句我個人偏好的術語：它是既有概念性又有歷史性的。

在下文作出更詳盡的討論之前，我們需要在此先對現代性的特點進行初步的描繪，此描繪有別於其他許多的觀點，而承認上述張力的存在。就概念上而言，我通常將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情況，其中充斥著某種雙重想像的表意系統(double imaginary signification)。此表意系統有兩大要素，其一是有關人類自主性(autonomy)的概念，將人類視為認知與行動的主體，另一則為有關世界理性(rationality)的概念，即世界是可被有原則地加以理解的；以上兩個要素不僅自身曖昧不明，彼此間也充斥著張力。簡言之，現代性指涉某種情況，人類在其中不接受任何外部的保證者，亦即人類本身並不會假定這些保證者能夠肯定他們知識的確定性、確保他們政治秩序的可行性，或確認他們自我的延續性。雖然將現代性加以概念化的具體過程極端多樣，但其中絕大多數都認為現代性的主要特徵，在於人類認為是他們自己設定了各種規則和法條，從而規範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他們一同生活的情況，以及他們瞭解自己的方式。於是，有關自主性的假定以及尋求支配權的過程，便構成了現代性的雙重想像表意系統(Castoriadis, 1990: 17-19; and elsewhere Arnason, 1989; Wagner, 1994a: 第一章)。

社會科學對現代性的特殊承諾(此承諾同時也是社會科學侷限的來源)，使得社會科學經常將現代性的此種雙重表意系統，轉化為自身之論證模式毫無疑義的起點。自主性與理性被當成社會科學的基礎假定，它們被認為是已經達致，或至少原則上是可達致的，尤其是在追求社會科學自身的探詢之時，更是如此，而透過追求此種探詢，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自主性

與理性變成了這些探詢的前提，而它們自身既不被質疑，也毫無可質疑之處。社會科學傾向於將現代性的想像表意系統，與西方的社會生活現實合併在一起。或是借用韋伯(Max Weber)的話，理性化「並非某人對其所處生活環境逐漸增加的一般知識」，而是他「知道或相信，只要他願意，他總是能夠去了解它們」(Weber, 1975 [1919]: 17)。現代性的崛起，就是以後者信念的強化為特徵；它並不是、或至少並不必然是前者的那種社會現實，亦即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並不總在增加他們對自己所處世界的知識。在下文中，我保留「現代主義」(modernist)一詞，以代表那些將現代性誤認為上述後者的取徑。就這點而言，社會科學有極大部分是現代主義而非「現代」(modern)的。在此「現代」一詞用以代表支持同一個自主性與支配權之想像表意系統的態度，但它既有能力，也願意去反思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以及此現代性理想之侷限所帶來的後果。

這個定義步驟的首要結果，便是創造了一個有關現代性的論證空間，亦即一種詮釋空間(interpretative space)，其中現代主義的立場只佔據了一部分，這也就是說，現代主義從來不是毫無疑問地被接受的，即使在社會科學中也一樣。在現代主義社會科學的全程歷史中，批判的聲浪持續不斷，而其中有三個時期因特別重要而值得一提。當十八世紀面臨轉向時，社會科學正處於奠基時期，而當時已被提出的浪漫主義，作為各種社會科學內，除現代主義之外的另類選項，迄今仍具有持久不輟的重要性(參見範例 Rosenblum, 1987; Taylor, 1995a and 1995b)。其次，十九世紀末時，關於知識論和方法的著名爭議，標示了批判性論辯的復興，此復興導向了目前我們所謂的社會科學古典時期。韋伯本人那些最近被重新發掘的作品，仍被拉扯於政治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以淵遠流長的說法而言)，而明確地定位於現代主義社會學的奠基時刻。

第三，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關於社會科學取向的某種嶄新、廣泛的論辯就已經展開。此論辯有許多要素，其中包括了各式各樣的取徑，例如應用在社會科學概念與論述方面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另外還包括對於歷史比較(historical-comparative)研究的更新熱忱、恢復以人類學的觀點去探討西方社會、性別與後殖民研究，以及科學知識的社會學。一九八〇年代時，研究者嘗試在後現代主義的總標題之下總結這些批判。雖然此標籤在許多面向上(一直)具有誤導性，但它至少有兩大優勢。首先，它標示著一種新批判形式的興起。若進一步觀察，我們會發現此形式並非全新，因為其思考方式經常廣泛地牽連到受尼采所啟發的哲學。然而，它卻有別於現代主義社會科學的那種批判，該批判所觸及的面向基本上是從浪漫主義出發，朝著尼采與韋伯的方向行進。我將在下文中試著進一步闡明此不同點。

後現代主義一詞的另一項優勢，在於它再度將對「現代性」的明確關注，引進社會理論和政治哲學之中，儘管擁有此優勢的代價也許是，現代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都產生了天大的誤解。可以這麼說，在外放(outgoing)的二十世紀歷史情境中，此種思考模式基於某些可識別的原因而得勢，稍後我也將回頭探討此問題。經常被用以暗示現代性已耗盡其權力而奄奄一息的公理(theorem)，諷刺地(但非全然無意地)復興了關於現代性境況的反思。撇開其他不談，後現代性的論辯提醒我們一個事實，即現代性的議題，遠比哲學中的現代主義，以及社會科學所願接受的還要來得深遠。在第一種情況下，「後」(post)這個前綴詞，暗示了現代性的時間面向，於是焦點再度轉回「現代性」一詞的雙重意涵上，亦即其難免是概念性與歷史性的。

歷史上，現代性經常直接指涉「西方的歷史」。更具體而言，它指涉歐洲歷史，並隨著時間推進而涵蓋北美歷史。因此，

若綜合各項觀點，則現代性最早起始於十五世紀中葉至末葉之間，並和文藝復興、發明活字印刷，以及探索航行(voyage of discovery)同期。若以最晚來看，現代性則可能始於二十世紀早期，並和藝術及建築的現代主義，以及心理分析所提供之嶄新的自我省視形式同期。在這兩種說法之間，也有人認為經濟現代性，與市場革命及工業革命是同時開始的，而政治現代性則和美國及法國革命一樣，起步於十八世紀晚期。以現代性為目標的各種科學與哲學革命，可在這條時間線上以多種方式標示出來：從笛卡兒的理性主義(Cartesian rationalism)和實驗方法，到世紀末(fin-de-siecle)對科學與形上學的批判，然後再到相對論。姑且不論其準確日期為何，現代性的出現總被認為標示著一種分裂，導致西方在全球性的比較下具有某種特性。但是，任何此種有關分裂的歷史性描述，對於從概念上去理解現代性，總是會存有某種張力。即使在那些被引述的事件與過程當中，確實有些選項比其他的來得適宜，但仍未有任何一個選項能充分體現有關自主性的假定，或是對支配權的追尋。

同樣地，人們所謂的現代性終結，可能代表兩種相當不同，但並非全然互不相容的意義。就歷史角度而言，該原理所指的應是西方特性(specificity)的完結。而這又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此特性之所以流失，是因為西方形式的社會生活與社會組織模式已經遍布全球；第二種則是，那些形式在某種程度上已被拋棄或轉化，以致於其獨特性已然消失。若沒有進一步釐清概念，我們將無法對這兩種可能性進行評估。人如果不再相信自己能夠設定規則，而是乖乖地順服於體系的要求或全球的權力結構，這種情況是否就代表了「現代性的終結」？抑或「現代性的終結」指的是十八世紀末以來，雙重歐洲解放運動的普遍化？這裡所指的雙重歐洲解放運動，其一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民主化」，另一則是市場力量的自由化。一旦現代

性走上末路，人類會否終將成為世界真正的主人？又或者他們會受控於自己一夕釋放的力量，而成為無力反擊的客體？嘗試回答這些問題時，必須經由一種社會歷史反思來進行，反思的對象即為自主性與支配權的雙重現代表意系統，如此一來，便能將概念性與歷史性的問題結合在一起。

貳、多元性與可能性

然而，極少出現這種以批判精神將問題結合起來的做法。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時，大部分的社會科學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特定歷史上對某個問題群(*problematique*)的詮釋，誤當成現代性的一般問題群。於是，社會學傾向於將歐洲國族國家的歷史形式，和政治問題群的解決之道合併在一起，或常有人以「社會」的概念去表達，而將政治問題群稱為有關社會秩序的問題。許多現代及後現代哲學的錯誤在於，它們尋求的是對問題群的一般性解決方法，這些問題關乎於知識的確定性或政體的可行性等等；又或許它們的錯誤在於，不應該開始此種注定徒勞無功的追尋。為了避免這些錯誤，我較早的著作《現代性的社會學》(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Wagner, 1994a)一書，本身就主要以歷史佐證來推展，而非明確的理論化。本書所欲闡明的社會理論與哲學，即為此種重新描繪的必須條件。然而，本書並不會脫離歷史形式，轉向理論或哲學形式，而是會試著重新思考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為了說明這項目標，同時也為了進一步說明對現代性的可能理解，我們可簡短地探討《現代性的社會學》之侷限。那本書已經在概念上，將現代性的理論化與現代性的歷史性連結在一起。然而，當時此關係不僅仍舊相當隱晦不明，而且它還是

在雙重侷限的情況下發展出來的。以社會歷史角度而言，那本書聚焦於西歐，並將西歐經驗與美國的現代性作一比對，後者在大部分情況下都顯得較為「自由」，此外也將西歐經驗對比於蘇聯社會主義的現代性，後者一貫地顯得較為「組織化」。基本上，書中僅限於運用兩個場域進行概念上的分析。首先，在歷史上介於較「自由」與較「組織化」現代性之間的此種擺盪不定，指出了個人主義者與集體主義者在詮釋自主性時的張力。第二個焦點在於詮釋集體規劃時，程序性詮釋與實質性詮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用以組織歐洲現代性的兩大實質資源間的張力，此兩大資源即為由文化和語言所界定的國家，以及由社會所定義的階級。

此侷限使得分析無法完全展露人們對所謂現代性文化的理解，現代性文化意即人們從多種不同的社會歷史角度，去詮釋現代性的雙重想像表意系統，以及這些詮釋所利用及動員的各種資源。例如在西歐的法國和德國之間，或是以範圍更廣的「西方」來看，即在歐洲與美國之間，那些資源都遠比書中所顯示的更為豐富且多樣(參見 Wagner, 1999a; Zimmermann et al., 1999; 以及第五章)。一旦有人將注意力轉向非西方社會，豐富性和多樣性還會大幅提升。在諸如「現代性的多樣性」(varieties of modernity)或「多重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等標題之下，有一項研究觀點在近期開始發展，目標在於分析現代表意系統在詮釋上的多元性(Arnason, 1998; Eisenstadt, 1998; the Daedalus issues of summer 1998 and winter 2000; Friese and Wagner, 2000)。根據我們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分析，並撇開所有詳細的限制條件不談，這點似乎足以回應那些關於「全球化」的普及論述。正如「全球化」一詞所隱含之意，全球化往往太常假設，通訊和運輸關係的日益緊密，必然會導致社會的全面匯合，而這種現象將為個人理性主義式(individualist-rationalist)的社會理

論化所記錄，並由新自由主義政策(neo-liberal policy)的規劃所導致。

- 對現代性多樣性的歷史經驗性觀察(historical-empirical observation)，可在現代性(甚至是現代性計畫，如果有些讀者偏好此種強調)基本的開放性上，找到概念上的互補。在現代性的情境下，總是有一定範圍的可能性存在，即使有些可想像出來的可能性依舊難以實現。但是，若現代性的歷史同時瞭解多元性與可能性，那麼會否有一種理論化，能夠表述所有現在與過去的多樣性，同時也表述對未來開放的各種可能性，而它本身卻無須採納某種模式的多元性和可能性呢？這問題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或者，以更強烈的語氣來說，一個單一且穩定的理論觀點有其必要性，這點已被確立是必需條件，因為若缺乏這一點，我們就不可能進行任何穩定的分析或批判。
- 8

因此，套用一句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常說的話(Jurgen 1985)：現代性的哲學論述長久以來就在尋找一個穩定可靠的解決方案，以解決上述的基本問題。C 也許最重要的是，似乎有種現代方式可用以確認知識的確定性；同樣地，也有現代政體與現代自我的存在。這些問題都各有其對應的答案，這特別是因為這些答案若不存在，現代計畫自身的可行性就會遭到質疑。過去二十年是所謂的後現代時期，有一些討論上的建言持相反意見，認為這些問題原則上可以沒有答案。知

C: 當哈伯瑪斯(Habermas 1985: 57)敏銳地描述黑格爾(Hegel)，認為他是首位「導致現代性變成一個問題」的哲學家時，就已經暗示了哲學論述的任務，即：解決這個問題。哈伯瑪斯讚揚黑格爾完整地辨識出並接受現代性無法避免的分裂，但他批評黑格爾揚棄了一個有望解決問題的方法，即透過有關傳播及相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論。人們有可能接受此種理論上的立足點，但同時也主張現代性依然是「一個問題」，因為其主要面向中，有各種各樣無法相互化約的「解決方案」。如果哈伯瑪斯和其批評者之間的論辯之前是聚焦於以上此種可能性的話，將會更有成效。

識論相對主義(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的出現、告別那些將政治秩序連繫在一起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以及主體的去中心化(de-centring)，這些事件看來都是無法避免的。有些評論家，其中尤以羅遜(Richard Rorty, 1989)最為突出，認為那些針對語言、社群和自我之偶然性(contingency)所提出的新興洞見是毫無疑問會出現的，有問題的反倒是後現代自由主義漸露端倪的可能性。

相對而言，我的看法是，現代性的歷史性需要詳述並闡明理論化模式的多元性，此詳述必須足以表達現代性的多樣性，也足以應付現代情境對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問題群。因此，我試圖在本書中進一步拓展有別於上述看法的另類觀點。此觀點堅持，問題群向來是、也將一直會是社會政治現代性的一部分。現代性的特徵是那些持續開放的問題群，而非對既有問題的特定解決方法^D。在這些問題群當中，我們尤其關注下列問題的存在，即追尋確定的知識及真理、建立可行且良好的政治秩序、有關行動者連續性的議題，以及在我們所生活的現代時空下，如何連結到過去與未來。若缺乏對人類自主性的某種假定，這些問題便不會出現，所謂的人類自主性，即是人類為自身制定法則的能力。這便是為何他們擁有具現代特徵的基礎。但這項假定不能自認為理所當然，同時它也未導向解決方案。因此，現代性在構想這些問題群時，便過分限制了多樣化可能性的出現。

這些問題群與現代性同時出現，我們既無法拒絕它們，也無法藉由找出它們的「現代」解決方案而將它們一網打盡。接

D: 這並不是說，完全沒有任何解決方案存在，也不是說解決方案沒有優劣之分，隨著論證的行進，這點將變得清楚明確。但是，解決方案具有歷史性，因此它們有可能是暫時的。而且那些用以評估它們品質的標準，自身也可能經歷變遷，至少在現代性中的主要社會政治與智識轉換過程就是如此，此外這些標準也可能引發爭議。

受現代性雙重想像表意系統的社會，注定要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且制定那些答案。因此，暫時穩定的解決方案確實可能出現，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及美國的「黃金三十年」(thirty golden years)就以暫時性穩定的妥協著稱，該妥協針對政治問題群的答案，在各種可能的組合中取得折衷點。換言之，我們在詮釋那些構成現代性的問題群時，總是必須將它們具體的時間性(concrete temporality)，以及它們所處的特定歷史場域納入考量。

9

參、無法逃避性和可達致性

我所呼籲的理論化模式多元性，的確以某種方式存在於現今的社會科學與社會哲學中。然而，由於人們極少將各種立場放在一起討論，因此該多元性並未被詳述或闡明。將現代性當前的社會理論化視為具有三個面向的智識場域，確實是相當熟悉的方式。

首先，且在此場域中最重要的是，若以經常和程序及傳播觀念有所連結的實踐角度來看，現代性的成就確切地被認為克服了任何針對實質與特殊基礎的需要，而這些基礎原是社會世界秩序所需的條件；其成就也在於利用普世主義的推論(universalist reasoning)取代這些基礎，我們可稱此種看法為古典現代觀點(classic modern view)。其次，在過去二十年來，經常有人主張，即便是這樣非實質的基礎，也是站不住腳的，且它們確實包含了隱藏的實質理念。於是，隨之而來的古典現代立場解構，就導致我們經常稱之為後現代思想的產生。此種所謂的后現代主義，認為任何類型的基礎都是既沒必要，也無法合理化的；更適切地說，此主義應被視為一種現代思想的基進化，它將自己的原則應用在自己身上。第三，可能也有人會(並

仍然)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而否定古典 - 現代、反基礎主義論點的效力,並嘗試發展出實質的理念作為某些論述與實踐的基礎,這些論述與實踐絕非僅是「前現代」(pre-modern)的,而是還禁受得起現代經驗的考驗。這類觀點常被標示為對現代性的批判,它可以相當傳統、並具有較多當代語言的形式呈現。

近期許多在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以及社會理論與方法論之間的爭辯中,一直以來就假定這些立場是清楚有別的。它們所提供的答案,大多被認為是沒有交集且互不相容的。某些對上述論辯的狂熱,確實源自於人們感覺到需要將自己(和別人)完全投入其中一個立場,並將其他觀點視為站不住腳的,甚至有可能認為其他觀點(在政治上和 / 或道德上)是不負責任的。

然而,若重新檢視其中某個立場可能針對另一個而提出的主要反對意見,我們反而會發現,它們自身就站不住腳了,因為這些反對意見明顯具有某種效力,即在某種程度上是無法反駁的。讓我簡短地闡明這點:現代主義的社會哲學認為,隨著現代性的來臨,只有傳統的基礎遭受質疑,而真正現代的基礎能被建立起來以取而代之。但如此一來,對此種解決方案的追尋,很快就證明是徒勞無功[或是悖論(aporetic)]的,因為那種真正現代的基礎並不存在,亦即沒有那種毫無爭議的基礎,可讓我們在其上建立現代社會秩序。於是,後現代主義者的結論是,一旦基礎遭受質疑,它們就不再被需要,甚至不可能存在。但肯定的是,每個社會對於諸如知識、政治和自我等事物都有實際上的理解,儘管這些理解可能具有爭議性,並一再於社會生活中被動員且成為鬥爭的原因。因此,最後可能有人假定,即使在現代性出現之後,拒絕現代「探險」(Lefort, 1986a: 23, 25)依然是種可行的選擇。若總是有些實際上有效的理解存在,哲學與社會學就必須擔負起任務,辨識出這些理解的基礎。但如

此一來，只要這些基礎遭受質疑，仍然還是無法回到任何類型的「根源」。

這些反駁的簡短出現，顯示出任一種立場的確可針對另一種立場，提出有效的抗議，而此過程是不斷循環的，一旦證成的不同秩序開始運作，關於證成的紛爭便將永無止境(參見 Boltanski and Thevenot, 1991)。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回答這些問題的模式，能夠具體宣稱自身是現代的。不可能給予一個最優越的答案，問題無可避免地持續存在，這兩點才是現代性的真正內容。唯有同時將那三種立場納入考量，它們才能開啟並描繪出詮釋空間，讓現代性的理論化得以在其中進行。我的論點並不聚焦於這些立場的相異處，而是關注它們意圖回應的問題之間、以及問題群之間的一致性(commonality)，同時我也旨於將這些立場互相連結，但並非將它們合併。

然而，不論是以歷史悠久的「傳統」(和「保守」)及「現代」之間的對立形式去理解社會世界，還是以晚近的「現代」和「後現代」之間的對立形式去理解，上述詮釋空間都未被充分理解。因此，描繪此空間的第一步，必須是嘗試重新描述那三種立場。我將試著做到這點，而把該場域的三重結構，重新詮釋為一種對現代主義概念的雙重質詢。

上文將社會科學現代主義的特徵描繪成一種思想，此想法將自主性與支配權的雙重現代表意系統，視為進行所有推論時毫無疑義的起點。於是，此種思想認為人們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並且有能力主宰世界。為了要完全達致這兩種特質，人必須和世界保持距離，走出世界並達致某個優越地位，同時能夠將世界視為一種既可知又可掌控的對象。這種思想普遍存在於智識生活的許多領域，它常被視為一種確切的科學態度(參見第一章)，雖然我們也能根據一種當前流行的做法，即利用一種無須以脫離世界為基礎的反身性(reflexivity)，去理解所謂的

「和世界保持距離」。在政治哲學中，這種現代主義可在個人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傳統裡找到，此傳統宣稱自身具有更優越的洞見，因為它建立了一個去脈絡化的「原初立場」(John Rawls, 1971)，而人們就是從該立場出發，進入與他人之間的契約關係(參見第二章)。以自我的角度而言，藉由自身「不受約束的理性」(disengaged reason, Charles Taylor, 1989)的力量，而主宰世界的個人，經常被視為現代人的完全體現。一般而言，理性論的個人主義，即目前在社會思想中所謂的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就表達出此種現代主義態度。理性選擇理論確實是新古典經濟學在智識方面的帝國主義式擴張(我將在第四和第五章中開始討論此一日益普及的社會理論模式)。

所有這些取徑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具有一個雙重的智識策略。這些取徑首先自大量不可靠的、來自社會 - 歷史世界的感官知覺(sensations)中撤離，以建立那些它們認為少數無庸置疑的假定，而理論化便能以這些假定為出發點，安全地行進。結果，他們以那些極少數的假定為基礎，重新建立了整個世界。他們的支持者傾向於認為，第一項行動淨化了理解，移除了任何反覆無常及偶然的面向。他們也認為，第二項行動創造了世界、科學和 / 或哲學效力的純淨形象，於是進一步的結論，包括實際的結論，都可藉此推演出來 E

原則上，在尚未開始討論第一項策略的優點之前(尤其請參見第一章)，便一直有人提出反對，認為此種行動並未、也無法達成目標。理論家選擇了各式各樣截然不同的起點；自主性與理性的雙重概念，僅是其中一個最有助於分析現代性計畫的例子。然而，無論選擇什麼樣的概念，它們都不會是純粹的、

E: 無論感官知覺與此形象之間有什麼樣的不協調，都將被視為理論和經驗觀察之間關係的次級問題。貫徹此書，我建議要重新思考的正是此種關係，從而建立起現代性的社會理論。

不會只是單純具備程序和形式，而缺乏實質內容。結果，它們無法標示出任何沒有疑義的起點，好讓思考能夠安全地啟程，同時，任何立基於此基礎上的世界，都可能遭受質疑，也就是質疑接下來的第二項策略。然而，促使上述想法在一開始時得以出現的，正是此種質疑。而此處質疑的對象，是世界在不確定的知識地位下所呈現的繁雜知覺。

相對而言，批判此態度的學者認為，這種現代主義的疏遠行動是既沒有保證，也無法達成的。它之所以沒有保證，是因為「人會依據特定理由提出質疑」(Wittgenstein, 1969: par. 458，較適當的翻譯可能是：「人會因為特定理由而提出質疑」)；總是會有「超出合理懷疑」的宣稱出現，即使對笛卡兒也是如此，而知識便會自這樣的宣稱開始行進。它之所以無法達成，是因為不受限的質疑，甚至會影響到有關該質疑自身的主張。正如維根斯坦(Wittgenstein, par. 456)所言，「因此，如果我懷疑或不肯定這是不是我的手(無論以何種意義而言)，為什麼不能以同樣方式去懷疑這些文字的意義？」維根斯坦本人觀察到這兩個論點之間的區別，但也指出讓它們總是維持彼此有別是有困難的。「在某些情況下，質疑是不合理的，但也可能有其他的情況，質疑看起來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這兩者之間似乎沒有明確的界線」(Wittgenstein, par. 454)。

本書從頭到尾所關注的是對現代主義概念的此種雙重質詢，此質詢不僅是知識論辯的特徵，也是一般當前社會哲學結構的特徵。每種質詢個別處理思想運動的一項特質，而思想運動正是現代主義的特徵。「現代性」宣稱必須令自身脫離脈絡，第一項質詢探討的就是這點，它也論及此一嘗試所帶來的負面結果。第二個質詢則將焦點置於現代性實踐上述作為的能力，以及它提升自己到某個位置、讓自己能從「外部」對自身脈絡產生作用的能力。前者強調的是無可避免的要求或需要，因此

其重點在於那些無法逃避的問題。相對而言，後者則強調現代性的力量，或更精確地說，是現代性力量的缺乏，因此它聚焦的是答案的可達致性，或更精確地說，即再次關注達致後那些無法令人在完全滿意的情況下的答案。於是，這兩種反對意見都提出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其中任一批判皆不能化約至另一個，因為它們批判的方向並不相同，雖然正如維根斯坦所強調的，它們也彼此相關，有時我們很難分辨它們。

如果現代性的特徵，在於其早期、「原始」的嘗試，亦即試圖讓人類自我(基本上即為知識追尋者和政治性存有)脫離自身脈絡的話，那麼只要謹慎地將歷史化詞彙引入，就能相當不證自明地將現代主義論述和現代性的出現連結在一起。在所謂的早期現代時期中，主要的思想家有笛卡兒(Descartes)和霍布斯(Hobbes)，還有一些稍晚期的啟蒙運動思想家(第一章和第二章有更詳細的資料)。反對這個現代主義觀點的理論化則堅稱，我們需要實質地、而非單純地在定義或程序上，去達致自我、知識與政治，並因此堅持這些問題實質上是無法逃避的，而對於嘗試脫離脈絡時所遭遇的原則侷限，該理論化是針對這點所提出的第一項智識回應。歷史上，浪漫主義最早完整表達出此理論化，而這種思想標示了十九世紀時許多關於現代性可行性的爭議。相對而言，第二項回應可更恰當地理解為智識上對於現代性的歷史性成功而作出的回應，即回應原始脫離(original distancing)在歷史上的成功。正是在此種意義上，尼采成為此一思考模式的關鍵人物。第二個回應不像第一個那樣為可達致性的問題提供答案，而是強調該問題有原則且持續的開放性。如此一來，它重新界定了有關無法逃避性的概念，令之從一個對答案的需要，轉變為一個問題群的領域。第二項回應再次與第一項回應連結在一起，但它無法像第一項回應那樣維

持堅定的實質立場，而這正是第一項回應的特徵⁶。

肆、現代性的消失點

本書將探討有關知識確定性、政體可行性、自我的延續性、過去的可企及性，以及未來的透明性之問題，這些問題是無法逃避的，而持久不變的答案是無法達致的。竭盡所能地辨識既不能拒絕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並不是一件極有成果的工作。肯定的是，雖然有人可能認為，缺乏一個可將那些無法逃避問題一網打盡的已達致答案，也許會影響我們回答其他問題的方式，但並非所有社會科學的問題都屬於這個範疇。橫跨哲學與社會理論歷史之問題群的持續存在，並未試圖推演出各議題的無法逃避性，而是可能足以作為一項指標。此標準不應立即被視為僅是指涉時間上的持久；議題也必然跨越各種概念化的模式而持續存在。

我提出問題的方式，也許看似特別偏好現代主義的理論化。但我只是肯定這些問題，而非肯定現代主義式的答案。我也的確認為，現代主義的優點之一，就是以一種清楚且基進的方式將這些問題提出來。這也是為何我較常採用現代主義、而

⁶ 在較早的嘗試中，我們已將術語形式化，並指涉社會思想的第一、第二與第三種模式(Friese and Wagner, 1999a)。我們的用意在於迴避較為特定的用語，例如「浪漫主義」和「尼采主義」，這些用語的內涵傾向於順服有關這些思考模式的多餘先入之見，而且可能較適用於將要討論的某些問題群甚於其他問題群。然而，此一形式化導致了新的誤解出現，若以此觀點來看，該形式化所付出的代價是極高的。因此，在希望能夠達成以下兩個艱鉅目標的情況下，此呈現過程將避免形式化，而嘗試證明(1)有一種社會理論化的詮釋空間存在，其中充斥著各種無法彼此化約的模式(對這些模式而言，戰鬥用語是不適當的)，並說明(2)這些模式可藉由展現它們共有的問題群，而和彼此產生關聯。

非其他模式去闡明問題的原因。若要在其他模式中使問題清晰可辨，就需要歷史說明和概念轉譯，我將在後續章節中對這兩者作進一步的說明。另一方面，我認為理論化模式具有無法化約之多元性的此一看法，看來可能會導致對第二項回應的偏好，這是為了強調可達致性的問題。我確實認為(只有)第二項回應開啟了空間，讓我們得以充分反思那些問題的重要性。但我主張的核心來自於某種理念，即認為那三種模式必須和彼此連結以創造有各種可能性存在的空間，而答案將可在該空間內找到。 13

因此，我認為在各種理論化模式的範疇裡，這些問題一般都可被辨識為重要而基本上無法解決的議題。誠然，無論是從哪一種立場出發，我們都會傾向於以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尋找工作答案，但每個特定的答案都會錯失議題的某個相關面向而失焦。總是有東西從我們眼前逃開。這就是有關消失點的空間隱喻有用的原因。有關無法逃避性與可達致性的議題，就處於社會理論化的消失點。它們建構了對世界的觀點，但它們本身無法被掌握。社會理論化形成一個三角空間，消失線就從這三個端點出發，朝著那些議題行進。這三種模式中的任何一種都可用以檢視那些議題，但每種觀點的特徵都有別於彼此。正是它們對消失點的指涉，將它們連結在一起，也正是它們之間的差異，才創造了有各種可能性存在的空間。

本書主張重新思考一些此種無法達致卻不可逃避的議題，而檢視這些議題一直以來是如何被加以處理卻總是一再逃開。這裡所採用的呈現模式主要並非哲學式的。更確切而言，對解決方案的尋求將被置於歷史的時空當中。此觀點是關乎於概念與實踐的一種歷史社會學，即使它有時會延伸至極遠的距離。就它所處理的議題而言，它同時也在社會學論證的疆界運作。若它達成某項所欲達成的目標，它便會將人們可能用以思

考現代性的理念，連結到研究社會世界的方法上，而在這些方法中，現代想像表意系統(modern imaginary signification)是極為重要的。